

中國特色國家主義

——「天朝主義」文獻評述與脈絡分析

• 桑 河

一 前言與綜述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國家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在舊有的民族主義基礎上更顯精緻化、理論化。甘陽、劉小楓、強世功、王紹光、章永樂等學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甘陽自1980年代便藉創辦《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和一系列叢書嶄露頭角，在1990年代「新左派—自由派」大辯論中與王紹光同為新左派代表人物。劉小楓早年以對基督教思想史的引介而聞名於學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則搖身一變為「二施」（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代言人。強世功則可謂國家主義在法學界的代表人物，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章永樂等後起的年輕一代國家主義法學學人。

對於這一套國家主義論述，中文學術世界裏與之的對話乃至爭論絡繹不絕。但是，這些對話大多是針對國家主義下的各種具體理論、主張，專文梳理國家主義敘事的努力較為少見。許紀霖較為系統地總結了這種思潮的前世今生，並指出其中歷史主義與國家主義合流的趨勢^①。鄭姿妍通過階級分析將左派被國家主義招安的根源歸因於國家資本的崛起^②。高超群同樣指出，國家主義者是以國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與一部分官僚集團、特殊的高層政治集團的結合，並通過與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結盟而贏得公眾輿論支持^③。陳純深入這套話語的內部理路，認為甘陽提出的「通三統」符合當代黨國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標準：「為一黨專政辯護；與馬克思主義無縫接合；與市場化改革沒有衝突；具有悠久的歷史，存在多樣的詮釋空間；能夠給出一個導向中國共產黨掌權的近代史敘事；能夠指導中國未來的發展。」^④陳冠中則在對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的評析中，辨識出

* 本文曾作為博資考論文呈交周保松老師，在此感謝；主題靈感得益於多年前舊友田力，遙表致意。

一套他稱之為「中國天朝主義」的意識形態：「一、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一個模板。」這套意識形態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與中華儒家文明教化^⑤。



陳冠中辨識出一套「中國天朝主義」意識形態。（資料圖片）

鑒於國家主義本身已是一個政治哲學的主流派別，用「國家主義」來指稱這一套話語不免無法凸顯其中「中國特色」的精髓；而廣泛沿用的「通三統」（旨在論證儒、毛、鄧三統的連續性）概念卻更多的是一種方法論，並不能鮮明地體現這套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下文將提到，已有自由主義學者用「通三統」這種方法來重敘中國歷史以發掘其中的自由民主價值）。因此，筆者更青睞於陳冠中所提出的「天朝主義」概念。但不像陳僅僅在央地關係的維度上使用這一概念，本文將嘗試用「天朝主義」這個詞來指代這一整套中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即在強調中央集權、黨國至上等國家主義核心主張的基礎

上，普遍使用古典資源詮釋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以證成其合法性，並為其未來提供一種上升到「文明」高度的想像圖景的學說。

不過，由於探討「天朝主義」的相關學者人數眾多，著述繁雜，如何比較清晰地呈現他們為黨國體制辯護的論證理由和路徑？田雷所著的〈「差序格局」、反定型化與未完全理論化合意：中國憲政模式的一種敘述綱要〉對此提供了一份寶貴的啟發。在田文中，「差序格局」命題是通過借用費孝通的概念來「概括中國多元複雜的、具有差異性的政治空間」，而「反定型化」則是借用了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表述來指陳黨國體制在改革開放時期政治實踐中的「自發性、非計劃性、多中心性」^⑥。跳出這篇文章本身，綜覽「天朝主義」學者的其他文獻，可以發現這兩點事實上一直貫穿在他們構建「天朝主義」敘事的思路當中，並且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單單局限於田文給予這兩個詞的定位。

因此，沿着田文所給出的理論「地圖」，我們可以嘗試大致勾勒出這樣一幅「天朝主義」話語的圖景：第一，「反定型化」進路：以政道觀消解「民主—威權」的政體區分，強調中共治理的靈活性，並配合不成文憲法命題和國家整合命題，抗衡政治權力需要受到正式制度限制的憲政訴求，拒絕為最高權力套上「緊箍咒」。第二，「差序格局」進路：通過施特勞斯學派（簡稱「施派」）的「德性」話語和古典學的研究路數接續政治儒學的「差序格局」，來證成在人民權利和央地關係這兩個維度上應當存在某種等級結構，進而證成中共領導地位和中央集權的合理性，以此反擊帶有普遍規範特徵的平等和民主訴求。這兩條進路都由重啟古今之爭的反啟蒙出發，最終都落腳於對一黨專政的證